

气候紧急状态：一种传播语境的转换

史安斌，童桐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 100084)

摘要：近年来，“气候变化”成为国际传播中的核心议题之一。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和专业人士倡导在新闻报道和公共传播中以“气候紧急状态”代替“气候变化”等概念开展气候传播工作。在气候传播日趋走向“部落化”的背景下，“气候紧急状态”概念的普及将会推动气候传播中的媒体角色和报道议题的转换，从而带来气候传播的语境转型。但同时这一转型过程放大了科学与媒体两者之间的逻辑争议，缺乏对现有气候传播结构性问题的回应。“气候紧急状态”的概念凸显了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国家间博弈。为此，我国的国际传播工作者应当对以“气候紧急状态”为代表的全球气候传播转型进行批判性接受和本土化借鉴。

关键词：气候紧急状态；国际传播；媒体角色；报道议题

中图分类号：G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418 (2022) 04-0071-09

2021年全球极端气候事件频现，北半球多国面临气温历史极值，中德等国接连遭遇百年一遇的极端降水天气。对此，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于2021年8月发布的报告指出，由全球气候变暖所导致的高温、暴雨天气已经比预期提前10年到来，全球各国必须为可能发生的气候灾难做出充足准备。^[1] 面对越来越频繁的极端气候灾害，近年来欧美国家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和媒体专业人士纷纷倡议，在有关气候议题的新闻报道和公共传播中使用“气候紧急状态”（climate emergency）代替“气候变化”“全球气候变暖”等概念，将其作为媒体及政府主体开展气候传播的统一口径。这一倡议在2021年获得广泛关注，除获得《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卫报》（*The Guardian*）等多家国际主流媒体的支持外，法国、韩国以及新加坡等国纷纷在2021年宣布本国进入“气候紧急状态”。

环境传播建构了人类对自然环境的认知^[2]，而作为环境传播的重要分支，气候传播集中体现了人类对于气候变化的认知和话语变迁过程。近年来，伴随着气候变化议题在全球范围内的升温，强调气候变暖紧迫性的“气候过热”（climate heating）、形容对气候变化持反对意见的“气候变化否认者”（climate change denier）等衍生概念相继出现，进入到气候议题的新闻报道和公共传播实践当中。作为这其中的典型案例，“气候紧急状态”在气候传播中的话语转型不仅反映着全球气候治理观念的变迁，还关乎有关气候问题的科学争论以及全球气候治理的国家间博弈^[3]，从而成为气候传播理论和实践中的核心议题之一。

为评估这一转型倡议对我国的气候议题国际传播工作可能产生的影响，本文以“概念史”（conceptual history）为分析视角审视“气候紧急状态”在国际传播中的衍生和语境转换过程。概念史的研究源自德国，20世纪90年代起开始受到国际学界关注。概念史即“概念的历史”，侧重关注概念演变后的政治与文化意识变迁。^[4] 词语本身具有固定的语义，但当其被赋予社会的经验意义时，词语就会转变

为概念。英国历史学家、“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斯金纳（Quentin Skinner）指出，概念史研究应当关注概念的辩论过程及争议性，回顾概念提出的关键时间节点，考察概念从首次提出到被逐渐“常规化”的整个过程。^[5] 回顾历史，19 世纪末，欧美学术界开始将原属“自然资源”范畴的森林视为一种亟待保护的“公共财产”，“环境主义”由此开始勃兴并进入主流政治社会话语体系中。^[6] 与之类似，“气候紧急状态”这一新概念的提出也代表着气候变化领域出现了系统性的认知转型。

在这过程中，媒体扮演着何种角色，其对全球气候治理和国际传播实践又产生了哪些影响？为回答以上问题，基于概念史的视角，本文在追溯并反思“气候紧急状态”概念源流的基础上，通过回顾“立即报道气候”（covering climate now）运动中的媒体倡议和报道实践描摹出这一概念背后的语境和话语转型过程。

本研究的分析材料包括“立即报道气候”（covering climate now）运动网站截至 2021 年 10 月的 107 篇评论文章以及 2021 年首届“立即报道气候新闻奖”的 39 件提名新闻作品。^[7] 基于概念史的理论要求，本研究在分析过程中将概念视为媒体实践与话语转型之间的一个连接阀，通过审视概念的提出、兴起及争议过程，对概念提出的适用语境及发展前景进行思考，为当下我国开展与气候议题相关的国际传播工作提供方向性建议。

一、概念源起与话语流变

（一）“气候紧急状态”的概念采用

回溯历史，“气候紧急状态”一词在 20 世纪 80 年代便已提出。彼时“全球气候变暖”（global warming）的概念刚刚在学界提出，来自美国宇航局（NASA）的科学家詹姆斯·汉森（James Hansen）和德国政府前科学顾问大卫·金（David King）最初将这种全球气温升高之后可能出现的自然灾害及生物大灭绝称之为“气候紧急状态”^[8]。由于当时人们对气候变化的科学成因及具体影响认识不完善，这一提法并没有获得重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接连发布报告，警告全球气候变暖的灾难性影响，气候变暖开始成为国际重要议题。这一阶段，“温室效应”（greenhouse effect）、“臭氧层空洞”（ozone inanition）等概念成为媒体报道的热点，但在全球舆论场上却难以形成“议程设置”效应。从 1997 年的《京都议定书》到 2016 年签署的《巴黎协定》，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机制因各国分歧一直难以得到有效的落实和推进。

直到极端气候灾害频发的 2018 年，120 多个国家爆发了史无前例的以“全球气候变化”为主题、以青年网民为主体的网络社会运动。瑞典“环保少女”通贝里（Greta Thunberg）为此而发起的“全球周五罢课”及其后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怒怼”各国领导人成为当年轰动一时的新闻事件。为了配合这一全球运动，欧美国家许多民间环保组织开始在抗议标语中使用“气候紧急状态”一词，这一概念频繁出现在欧美主流媒体的报道当中。科学界也积极呼应媒体和舆论的诉求。2019 年 11 月，1.1 万余名科学家在重要学术期刊《生物科学》（BioScience）上联署呼吁人类社会进入“气候紧急状态”。据统计，“气候紧急状态”的新闻报道使用量在 2019 年增加 100 倍，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将其列为当年“年度词汇”。^[9]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虽然暂时搁置了有关气候变化的全球讨论，但却在客观上加速了“气候紧急状态”的概念被各国政府接纳。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全球大流行使得公共卫生的“紧急状态”成为许多国家和国际大都会的管理常态。基于这一经验，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考虑将气候变化也纳入

“紧急状态”的范畴。可以说, 各国基于新冠肺炎疫情建立起的“紧急状态”公共治理经验极大地促进了“气候紧急状态”在气候传播中的概念合法化进程, 原本许多没有采纳“气候紧急状态”的媒体在援引政府官方文件的过程中也开始习惯使用这一概念。2020年12月,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在全球气候峰会上正式建议世界各国进入“气候紧急状态”, 这标志着这一语境化转型正式成为获得联合国背书的全球性倡议。^[10] 2021年, 美国、加拿大等国相继遭遇极寒和极端高温两种天气, 中国河南省和德国多州遭遇的百年一遇极端降水以及亚马逊雨林的森林火灾令全球各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联合国和各政府主体的背书下, 2021年7月28日, 《生物科学》第二次发表气候紧急状况声明, 再次呼吁世界各国立即采取实质性的行动和措施来应对愈演愈烈的“气候紧急状态”。随后的2021年8月, 媒体对气候变化的报道达到了近年来的顶峰, “气候紧急状态”成为被频繁提及的一个重要新闻词汇。^[8]

(二) “气候紧急状态”的话语流变

回溯气候传播的概念史, 相比于“紧急状态”, 将“气候变化”定义为可以被人为控制的“问题”(problem)或“危机”(crisis)是此前国际新闻传播中的常用报道规范。所谓“紧急状态”泛指“突发性的非常规处境”, 一般用来形容“战时状态”或是突发自然灾害及传染病大流行等“重大公共安全事件”等。从概念范畴上来看, “紧急状态”是一个公共管理和社会治理领域内的专业术语, 媒体一般不会主动在新闻报道中使用这一概念。^[11]

对于政府部门而言, 与“紧急状态”相关的另一个概念是“非程序化决策”, 即承认“紧急状态”概念在气候传播中的使用意味着政府要针对气候变化开展全方位的系统动员, 以非常规手段加速推进公共政策从制定到执行的漫长商议过程, 从而规避或应对迫在眉睫的灾难和危机。这个过程所耗费的资源成本巨大, 因此各国政府在使用“紧急状态”的概念时表现的格外审慎。^[11] 从世界范围来看, 真正在气候政策中采用这一概念的国家并不多。许多国家虽然宣布举国进入“气候紧急状态”, 但目前仍缺乏配套的政策制定。目前真正将这一倡议落到实处的主要为英法等欧洲发达国家, 由于他们早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碳交易制度, 在气候治理方面走在世界各国前列。作为气候治理的排头兵, 欧盟为配合“气候紧急状态”的提出, 在2019年底颁布了史上最严格的气候政策文件《欧洲绿色协议》。

那么, 为何“气候紧急状态”会在近年被媒体重新关注。回溯这一概念的历史和社会语境可以发现, “气候紧急状态”的兴起与近年来全球气候治理变迁的整体环境有关。从“全球气候变暖”被提出的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 由于普通人很难直接感受到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 相关治理政策难以获得公众认同, 间接导致全球气候治理的政策推进错过了最初的关键节点。^[12] 2010年以来, 虽然由气候变化所导致的自然灾害问题明显增多, 民众对气候变化的感知也在逐年提升, 但同一时间, 西方国家日趋严重的政治极化问题却为气候传播的普及带来了负面影响。在欧美右翼政客大肆鼓吹“气候变化否认证”之际, 有关气候变暖的争议也日渐白热化、极端化^[13], 从而导致有关气候变化的政策“议而不决”成为一种常态。

在有关“气候变化”议题的“文化战争”中, 1995年至2009年间出生的Z世代年轻网民起到了尤为重要的作用。例如, 在美国2020年大选中, 在选民代际走向年轻化的背景下, 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与警察过度执法、枪支暴力以及选举公平并列的四大争议性政治议题。在欧洲, 民调机构益普索(Ipsos)2021年在20多个欧洲国家进行的调查显示, 高达50%的青年网民认为“全球气候变暖”是当今最为严重的全球性问题, 其重要性甚至超越了“新冠肺炎疫情”和“贫富悬殊”等社会问题。^[14] 对于美国的党派媒体而言, “气候紧急状态”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媒体用来批评美国前任总统特朗普领导下的政府的

一个概念工具,这一背景成为“气候紧急状态”至少在美国被诸多媒体所接受的第一推动力。

因此,“气候紧急状态”在欧美国家已经成为环保主义者与“气候变化否认者”进行“文化战争”的一个重要议题,尤其受到年轻群体的关注,在社交平台上广为流行。在国际社会中,这一概念则主要受到话语权较为薄弱、但受气候变化影响较大的中小国家的青睐,如冰岛、马尔代夫。“紧急状态”成为此类国家在联合国气候峰会等重要场合敦促大国落实气候政策的政治筹码。相比于国家等政治主体,媒体对于这一概念的接受较为积极,当前这一概念被使用最多的场合仍然是气候报道,其中以美英两国的新闻传播实践最具代表性,媒体在气候传播中的作用也愈发凸显。

二、“气候紧急状态”语境下新闻媒体的角色转型

(一)“立即报道气候”运动与气候传播的部落化困境

除了政治原因之外,近年来西方媒体对于“气候紧急状态”的采用也体现了新闻业对于气候传播所遭遇到的报道困境的反思。以“气候紧急状态”为主题的传播转型趋势在新闻业的集中体现是《哥伦比亚新闻评论》(*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联合《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等行业媒体于2019年4月发起的“立即报道气候”倡议。这一倡议是“紧急状态”的概念能够持续获得影响力的关键,其口号是“像报道‘二战’那样报道气候变化”^[15]。在经历了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的“洗礼”后,这一概念逐渐被更多的媒体和公众所接受。为应对这场百年未见的疫情全球大流行,国际主流媒体紧急动员,纷纷强化了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24/7”报道制度,即7天24小时跟进疫情实时进展的全天候报道。面对2021年频发的自然灾害和极端天气,这些媒体积极响应“立即报道气候”的倡议,并将疫情期间建立起来的报道规范和机制“移植”到气候传播当中。截至2021年9月,共有包括《卫报》(*The Guardian*)、《国家》(*The Nation*)在内的30余家媒体参与到这一倡议之中。其中《卫报》总编辑凯瑟琳·维纳(Katharine Viner)表示,全球气候变暖是人类所面临的最大危机,而“气候变化”一词过于温和,难以反映这个时代所面临的真正的气候灾难。该报还发布了一份采编备忘录,倡导在相关报道中使用“气候紧急状态”这一概念,并就此提出了指导性的建议。^[16]

这场由学界和业界共同发起的“传播转型运动”主要针对的是近年来气候传播的“部落化”问题。在社交平台和智能传播的加持作用下,不同利益群体对于气候变化的认知和政策诉求存在着较大分歧,这使得不同立场的媒体在新闻来源与观点上的差异明显,媒体合作难以开展,有关气候变化的公共讨论也难以达成社会共识。

气候传播“部落化”趋势的一个负面后果是,多数新闻媒体在对气候问题进行报道时过于保守与谨慎^[17],无法形成强有力的议题设置。“气候变暖”概念问世40年来的新闻传播实践表明,以常规报道规范来面对气候变化这一全球威胁,难以实现科学家所说的将全球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这一愿景。有鉴于此,各国新闻媒体应当摒弃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的偏见,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加强合作,开展全方位的、具有整合性的角色转型。而“紧急状态”的概念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这一困境的回应。气候传播作为一项具有专业化属性的报道领域,不同国家地区甚至是同一地区内媒体之间的报道能力都存在差异^[18],能够促使不同媒体达成合作的前提是增强媒体的公共属性,而这背后也体现着气候传播的媒体角色转型逻辑。

(二)气候传播动员者角色凸显及议题转向

新闻媒体对于“紧急状态”议题的关注不仅仅是气候传播报道“规范”的转变,还体现了新闻媒体在气候传播中的角色转型。研究显示,欧美新闻业对于自身的角色定位,相比于一般意义上的“传

播者”与“阐释者”^[19], 从事环保报道的记者更倾向于将自身定义为“社会活动家”, “紧急状态”在气候报道中的常规化使得“环保记者”这一角色变得更加突出。^[20]以“立即报道气候”运动为典型案例, 通过对这一媒体运动的最初倡议、近两年相关奖项评选标准以及重点媒体的报道方针进行分析可见, 新闻媒体在气候传播中的角色转型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 在编辑方针方面, 部分媒体在采用“气候紧急状态”报道方针后, 正在减少气候报道中的科学和政治新闻的内容, 转而关注青少年群体在气候议题下的社会行动, 以及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弱势群体的真实生活。^[21]当下的新闻媒体在报道气候变化议题时引用了过多的科学专业术语, 但实际上气候变化的质疑者多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 难以对此深入理解。新闻报道应当顺应智媒时代的变化, 增加更多情感元素, 以更有温度的方式报道“气候变化”这类“高冷”议题。例如在2021年“立即报道气候新闻奖”的所有提名作品中, 有三分之一的新闻作品都是以气候变化背景下普通人的生活为主题, 这体现了当前主流气候新闻领域对这一报道类型存在的偏好。

其次, 不同国家、不同类型和不同立场的媒体开始在气候报道上开展深入合作, 摒弃“揭丑曝光”的传统报道模式, 采纳“建设性新闻”的理念, 以全球气候变暖的“解决方案”为报道核心, 形成强有力的议程设置。^[21]此前媒体在报道气候变化问题时常用的做法是通过强化气候变化的“威胁性”, 增加公众对气候议题的关注, 但已有研究表明, 这一报道形式对于公众的影响实际上是微乎其微的。^[22]因此, 与其用耸人听闻的故事、数字和细节“警醒”公众, 倒不如直接报道不同气候变化解决方案对日常生活的影响, 拉近决策者、科学家与普通人的距离。在这方面具有说服力的案例是CNN及路透社等西方主流媒体近年来有意将气候新闻中的科学数据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 令气候变化新闻以“社区新闻”的姿态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最后, 对于记者而言, “立即报道气候”倡议认为在进入紧急状态后, 媒体人应直接进入环保运动的现场, 以动员者的姿态参与其中。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媒体的这一角色转变称为是气候变化议题下的“人类红色代码”, 即记者不应仅是气候变化的报道者, 而应当参与到气候变化的“社会程序”改造当中。《纽约时报》资深气候记者皮埃尔(Kendra Pierre)指出:“记者只有亲身参与到弱势群体的生活当中, 才能够讲述真实的气候变化故事。”这一趋势的代表性案例是《泰晤士报》(The Times)将气候变化议题与2020年爆发的“黑命贵”(BLM)运动相结合, 探讨气候变化与种族主义歧视背后的关联。记者通过亲身参与和实地调研后得出结论: 种族主义与气候变化问题存在类似的社会根源, 这就导致了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种族主义的枷锁下难以推进下去。^[23]

以上种种实践表明, “气候紧急状态”这一概念已经深入影响了当下国际新闻传播的实践探索。在其引导下, 新闻媒体也正以更为积极的角色参与到全球气候治理当中, 成为重要的行动者, 并且也强化了环境记者本身所具有的动员属性。但不容否认的是, 在气候传播的转型过程中, 以“立即报道气候”为代表的媒体角色转型也招致了诸多争议。

三、“气候紧急状态”语境下气候传播的转型争议

(一) 科学逻辑下的气候传播困境

对于“紧急状态”下的气候传播转型, 新闻界和科学界也出现了一些质疑和反对的声音。相当数量的新闻媒体以“过于激进”为由拒绝参加“立即报道气候”的倡议。他们认为, 以“紧急状态”的理念为引导进行报道, 有可能与新闻客观性原则发生冲突。^[23]新冠肺炎疫情流行期间的媒体实践也表明, 危机议题的报道会使公众长期处于由“信息焦虑”所引发的高度亢奋状态之中, 从而导致“新闻

倦怠”，最终丧失对重要新闻事件的兴趣。如果说不断变异的新冠病毒使人类陷入了一种“集体疲劳”，那么连篇累牍的“气候紧急状态”报道也很可能让公众陷入另一种“新闻倦怠”。

虽然气候传播转型的最初支持者主要是科学家，但这类群体对于将“紧急状态”应用到气候传播工作中却普遍持审慎的态度。在科学传播中，科学家与媒体之间存在着固有矛盾，即科学家倾向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媒体通常会简化科学议题的复杂性以获得轰动效应。^[24] 气候变化议题恰好具有高度的科学争议性。为制作高质量的气候报道，记者和编辑应当向科学家了解充足的背景知识。但从主流媒体现有的气候报道来看，科学家在其中的参与情况并不乐观。从新冠肺炎疫情流行这一“紧急状态”下的公共传播经验来看，只有科学机构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相关的新闻报道和传播活动才能够真正起到作用。例如，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在新冠肺炎疫情流行期间提供的实时数据是全球媒体开展相关报道的重要来源，为全球科学防疫提供了坚实基础。

相比之下，对于“立即报道气候”倡议，剑桥大学人文地理学教授迈克·赫尔姆（Mike Hulme）一针见血地指出，一方面，这一运动“从一开始便缺乏科学家的参与，诸多媒体倾向于以统一的口径和消息源进行报道”。^[25] 另一方面，目前以社会运动为核心的报道方针会使得媒体过于依赖既有报道语境，存在简化科学研究的风险，即容易将科学的初步发现转化为既定事实，从而进一步拉大对于气候变化的认知分歧。

从社会治理的视角来看，“紧急状态”意味着有关气候治理的公共政策将缩短商议过程，即以最为简化的程序换取最低限度的共识。程序的缩短通常意味着科学性和严谨性的降低。科学家虽然对于全球气候变暖存在明确共识，但在气候变化的具体影响上，如全球变暖所带来的飓风频率变化、冻土融化速度或“绿色新政”的执行效力等微观议题上，科学家意见的分布则要复杂得多。忽视气候变化议题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以统一的报道规范对不同子议题进行报道，有可能导致气候传播陷入新的“部落化”困境。

此外，缺乏科学性考量的气候传播也容易陷入“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的政治情绪当中，即质疑气候变化便意味着“政治不正确”。^[26] 近年来，社交平台上由自由派发起的取消文化日渐盛行，其表现是“说错话就取消资格”。网民自发追踪和点名批评那些发表“冒犯性言论”的人，其中多为各界精英名流。网民对其发起集体抗议或抵制行动，轻则导致其声誉受损，被“取消”原来拥有的地位与特权，重则“社会性死亡”。这类“泛政治化”“泛道德化”的现象自 2019 年以来就已经形成了一股潮流，而在 2020 年欧美国家面临“抗疫”和“抗议”双重夹击的舆论氛围之下则被推向了极致。自由派和保守派借此相互攻讦，动辄“取消”对方。在“紧急状态”的话语文化下，身份政治和群体偏好会使得气候变化报道忽视对于科学知识和证据的通盘考虑。“紧急状态”在为新闻媒体进行赋权的同时，也容易放大隐藏在报道背后的“预设立场”。^[27] 目前气候新闻报道所转引的信源多为从事相关研究的科学家，而公共政策、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的专家则发声较少。从国家信源来看，“欧美中心主义”依然盛行，来自中国、俄罗斯、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声音遭遇有意或无意的忽视。上述缺陷在“气候紧急状态”下的新闻实践中很难获得显著的改观。

（二）尚未回应的气候传播的结构性问题

当今新闻业在气候传播领域所面临的诸多问题都是系统性、结构性的，大多数媒体在报道气候问题时并未将“气候变化”视为具有统摄性的“宏大叙事”，而是将其视为具有高度专业性的“垂类议题”，从而忽视了全球气候变暖与经济发展、社会平等、南北差异等宏观议题之间的重要关联，这也是“立即报道气候”倡议所针对的气候传播“部落化”趋势的根源所在。媒体间的报道差异是由政治立

场、市场体制、文化价值观等多重因素所决定的,这一点在不同类型媒体的气候传播实践中体现得更为明显。

对于传统主流媒体而言,由于2016年以来欧美政治“大气候”的变化,作为科学议题的气候传播逐渐走向意识形态化。首先值得肯定的是,近年来此类媒体在气候传播方面愈发积极。即使在过去几年预算大幅削减和机构裁员的情况下,《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美国主流大报对气候变化的报道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但这类媒体在气候变化报道上却存在“立场先行”的趋向。近年来,这类媒体将气候报道作为批评特朗普政府的重要阵地,将其转变为自由派与保守派进行意识形态论争的主战场,对气候变暖的解决方案却较少关注。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趋势在拜登政府上台后并没有得到缓解。^[25]

相比主流大报,电视媒体在气候报道上的“社会责任”意识更加淡薄。出于对收视率的优先考量,电视媒体倾向于将全球各地出现的极端气候异常现象描述为偶发性的“自然灾害”,却避而不谈气候变化的深层内涵。2021年8月底,在飓风“艾达”袭击美国的三天内,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NN、福克斯等主流电视媒体播出的共774条报道中,只有34条强调了气候变化的严重性。^[28]大量相关的科学研究显示,“艾达”之所以造成如此破坏性的影响,与全球气候变暖所导致的海洋温度升高和“风暴潮”风险的提高密切相关,而在电视新闻报道中几乎淡化甚至于忽略了这一诱因。

在气候治理中,新闻媒体最适宜的角色是将科学知识和有关气候变化的多元议题联系起来,并弥合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根深蒂固的利益冲突。基于此,相比于提升气候变化的预警级别,找出现有气候传播中不同媒体报道所存在的缺陷,敦促政府监管部门和各大企业——尤其是传统能源企业——承担起应有责任,应当是“气候紧急状态”传播的下一个转型重点。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提出,与其将气候变化形容为一场无法挽回的灾难,不如将气候变化与多元议题相融合,突出这一问题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属性。例如,在气候传播中,媒体可以将全球气候变暖与各类微观议题相连,并将其与本地民众的核心关切相互融合。这也是突破人类面临气候问题“短视效应”、引发公众广泛关注的主要手段。^[27]

四、总结与启示

当前,以“气候紧急状态”为线索的气候传播转型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初见成效,相关新闻报道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显著的提升。对此,我国从事气候传播的新闻工作者和相关专业人士应当结合具体国情和社情来准确把握这一概念的提出及采用。首先,从概念提出的语境来看,“气候紧急状态”提出过程中的政治考量远大于科学考量,其与近年来西方国家兴起的“气候否认主义”紧密相连,并以一种“对抗性话语”的姿态进入到气候传播领域之中。但从科学角度而言,这一概念能否引起公众进一步关注气候变暖的严重性仍需进一步观察。

其次,从公共治理的制度适配来看,“气候紧急状态”的提出也意味着全球将提高对气候变化的应对级别。美日等国在20世纪70年代早已出台《紧急状态法》^[29],而目前我国还没有出台类似的法律法规,因此面对“气候紧急状态”这一新概念,是否采用、如何采用,需要公共管理和新闻传播等多领域的专业人士加强合作,共同去作出符合我国实际的判断。

最后,在气候议题的全球传播层面,“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CDR)作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原则已经获得广泛认可。2020年9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中国将于2060年实现碳中和”,与“2030年碳排放达峰”共同组成“30目标+60愿景”,标志着中国全面进入绿色低碳时代,也向世界宣示以“十四五”为起点开启生态

文明新征程的决心,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典范。为保持议题的一致性,我国应慎重考虑“气候紧急状态”背后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治理的内涵,慎重考虑其对全球气候治理议程所产生的影响。^[30]

不容否认的是,“紧急状态”对于我国气候传播的专业化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在贝克(Ulrich Beck)所预言的全球风险社会中,未来人类社会将与全球性风险长期共存。^[31]气候变化很难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但新闻媒体能够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32]全球气候变暖的紧迫性是显而易见的,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21年发布的报告显示,即便将全球升温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到2050年仍然会有数亿人口因海平面上升而失去家园,1.3亿人陷入赤贫,数以万计的物种灭绝。^[33]对于我国而言,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既是履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使命,也是维护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现实需要。2017年10月,在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中,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重要论断,并指出“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应始终积极作为”,而我国的气候传播工作者必将在这一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长期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环境与气候报道中的专业水准与发达国家存在着明显的差距^[34],在全球气候传播话语场中处于“失语”状态^[35]。在“30目标+60愿景”得到国际社会普遍欢迎的背景下,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需要赢得与其贡献相匹配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重视气候传播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提升气候传播专业水准和议程设置能力将是我国媒体今后努力的方向。为此,辩证看待“气候紧急状态”的气候传播语境转变和话语转型,理解这一倡议背后的争议与洞见,对于当前我国开展有关气候变化的公共传播、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1] 张婧昊,李春元.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报告:极端天气将更加严峻[EB/OL]. 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13962216.
- [2] 刘涛.环境传播的九大研究领域(1938-2007):话语、权力与政治的解读视角[J].新闻大学,2009(4):97-104.
- [3] Anderson, A. (2021). Media, politics and climate change: Towards a new research agenda. *Sociology Compass*, 3 (2): 166-182.
- [4] 张旭鹏.概念史与历史比较——读何平《文化与文明史比较研究》[J].史学理论研究,2009(4):147-150.
- [5] Skinner, Q. (2002). *Visions of politic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6] 刘翠溶.什么是环境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12-60.
- [7]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Covering climate now. Retrieved October 9, 2021, from <https://www.cjr.org>. 2021-10-9.
- [8] Covering Climate Now partners. The press and the climate emergency. Retrieved April 12, 2021, from https://www.cjr.org/covering_climate_now/journalism-climate-emergency.php.
- [9] Ripple, W. J., Wolf, C., Newsome, T. M., Barnard, P. & Moomaw, M. R. (2020). World scientists' warning of a climate emergency. *BioScience*, 70 (1): 8-12.
- [10] 联合国秘书长呼吁全球进入“气候紧急状态”[EB/OL].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5925209390159211&wfr=spider&for=pc>.
- [11] 薛澜,钟开斌.突发公共事件分类、分级与分期:应急体制的管理基础[J].中国行政管理,2005(2):102-107.
- [12] Cox, R. (2010). Beyond frames: Recovering the strategic in climate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4 (1): 122-123.
- [13] Giddens, A. (2009). *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 Cambridge: Polity.
- [14] Allsop, J. The limits of the news peg. Retrieved April 26, 2021, from https://www.cjr.org/the_media_today/news_peg_chauvin_trial_shootings_climate.php.

- [15] Hertsgaard, M. & Pope, K. Why can't we call it an emergency? Retrieved June 3, 2021, from https://www.cjr.org/covering_climate_now/climate-emergency-statement.php, 2021-6-3.
- [16] Hertsgaard, M. & Pope, K. Living through the climate emergency. Retrieved April 12, 2021, from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https://www.cjr.org/covering_climate_now/living-through-climate-emergency-journalism.php.
- [17] Geisler, J. Why newsrooms are resistant to collaboration when covering climate. Retrieved September 18, 2019, from https://www.cjr.org/covering_climate_now/journalism-activism-collaboration-reporting.php.
- [18] 戴佳, 曾繁旭, 黄硕. 环境传播的伦理困境 [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3 (5): 154-160.
- [19] 路鹏程, 王积龙, 黄康妮. 徘徊在传播和动员之间: 中国环境新闻记者职业角色认知的实证研究 [J]. 新闻记者, 2020 (2): 89-96.
- [20] Sachsman, D. B., Simon, J. & Valenti, J. M. (2005). Wrestling with objectivity and fairness: U. S. environment reporters and the business community. *Applie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 Communication*, 4 (4): 363-373.
- [21] Rabinowitz, A. Climate journalism enters the solutions era. Retrieved April 21, 2021, from https://www.cjr.org/covering_climate_now/climate-solutions-journalism-mothers-of-invention.php.
- [22] Dryzek, J. S. & Lo, Y. A. (2015). Reason and rhetoric in climate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al Politics*, 24 (1): 1-16.
- [23] Hertsgaard, M. Climate-justice stories in every community, waiting to be told. Retrieved June 7, 2020, from https://www.cjr.org/covering_climate_now/climate-justice-george-floyd.php.
- [24] Nisbet, M. C. & Scheufele, D. A. (2007). The future of public engagement. *The Scientist*, 27 (10): 38-44.
- [25] Hulme, M. (2019). Climate emergency politics is dangerous. *Issu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36 (1): 23-25.
- [26] 史安斌, 童桐. 抗疫与抗议夹击中的美国新闻媒体: 角色与影响 [J]. 青年记者, 2020 (6): 72-75.
- [27] Nisbet, M. C. (2019) The trouble with climate emergency journalism. *Issu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35 (4): 23-26.
- [28] Hertsgaard, M. Why won't TV news say 'climate change? Retrieved September 2, 2020, from https://www.cjr.org/covering_climate_now/why-wont-tv-news-say-climate-change.
- [29] 莫纪宏. 中国紧急状态法的立法状况及特征 [J]. 法学论坛, 2003 (4): 5-12.
- [30] 李玉洁. 以中国为方法的环境传播话语建构 [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0 (4): 136-140.
- [31] [德] 乌尔里希·贝克. 风险社会: 新的现代性之路 [M]. 张文杰, 何博闻,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8: 20-30.
- [32] 赵斌. “退向未来”: 全球气候政治的伦理反思 [J]. 当代世界, 2021 (5): 34-40.
- [33] 参考消息. 联合国报告: 气候变暖将对人类健康产生严重影响 [EB/OL]. <https://new.qq.com/omn/20210624/20210624A04A4Q00.html>.
- [34] 赵月枝, 范松楠. 环境传播理论、实践与反思——全球视角下的环境正义、公众参与和生态文明理念 [J]. 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2): 28-40.
- [35] Agin, S. & Karlsson, M. (2021). Mapping the field of climate change communication 1993-2018: Geographically biased, theoretically narrow, and methodologically limited.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15 (4): 431-446.

[责任编辑: 谢薇娜]